

## AI浪潮中更要守住教育的“笨功夫”

文海撈真

●AI驱动的技术洪流势不可当。我们需要的不是筑起高墙,而是学会“驭浪前行”。



□邓海建

3月10日,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说,青少年过于依赖AI会出现很多问题,除了有损视力,还会阻碍思维、创造力、想象力发展,应该尽可能避免学生过早使用AI。陈众议说,少年儿童还是要靠自己阅读、思考,“该记的记、该背的背,否则会变‘傻’的”。

这样的担心,非杞人之忧。如今,AI已如空气般渗透进青少年的学习与生活。数据显示,截至2025年年底,我国生成式AI用户规模已达6.02亿人,超过六成的未成年人使用过AI。作业中,遇到难题不再是冥思苦想,而是习惯性地“拍照搜题”;书桌前,构思作文不再是绞尽脑汁,转向AI“寻求灵感”;闲暇时,与智能音箱的对话时长,或许已超过了与父母、同伴的真诚交流……这种便捷,在无形中编织着一张温柔的网,将独立思考的锐气、反复试错的勇气,以及从无到有创造的喜悦,悄然替代并消解。

聪明的技术与“笨拙”的学习并不矛盾。学习无捷径,过早过度依赖AI确为病态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更是敲响了警钟:过度依赖生成式AI,可能会“削弱儿童的基础性发展能力”,导致一种与大脑老化相关的“认知能力下降或萎缩”。当获取答案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,答案本身的价值也在快速贬值,而那些真正定义人之为人

的品质——探索的渴望、批判的锋芒、共情的能力,正面临着被技术“外包”的风险。

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,AI驱动的技术洪流势不可当,AI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已是大势所趋。政策层面,2025年4月,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》,明确要求“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”;同年5月,

《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(2025年版)》《中小学生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(2025年版)》等文件相继发布,2025年也因此被称为“智慧教育元年”。

问题的关键,不在于“能不能用”,而在于“怎么去用”。我们需要的不是筑起高墙,而是学会“驭浪前行”。这需要家庭、学校与社会形成协同共育的合力,在拥抱技术便利的同时,牢牢守住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底线。

家庭是筑牢防线的第一关。家长需率先走出对技术的恐惧或盲从,与孩子共同制定清晰、可操作的AI使用规则。例如,约定不使用AI直接生成作业答案,控制每日使用时长,区分辅助查询与创造性任务的不同使用边界。

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,责任尤为重大。它不应只是知识的传授所,更应成为AI素养的培养皿;将技术工具转化为激发深度思考的“垫脚石”,而非替代思考的“绊脚石”。

社会层面,则需构建一个健康、清朗的技术应用生态。科技企业应肩负起社会责任,在产品设计中内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,如更严格的实名认证、不可绕过的青少年模式、对代写等高风险功能的过滤等。监管机构需推动算法透明化,针对教育类应用制定更严格的内容审核与数据隐私保护标准。同时,应努力弥合“数字鸿沟”,让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孩子也能接触到优质、可靠的AI教育工具。

归根结底,AI虽是强大的工具,却只是教育的手段而非目的。教育的终极指向,是人的成长——是好奇心的萌发,是逻辑的建构,是情感的共鸣,是价值的塑造,是面对复杂世界时那份独立的判断与选择。我们不必因噎废食,将AI妖魔化;也不能放任自流,在技术的便利中迷失育人的方向。真正的智慧,在于让技术回归其工具本位,服务于“立德树人”的永恒命题。

## 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背后的“加减法”

伟伟道来

●高校主动调整优化专业的终极目标,是守护并激发人的主体性。



□程振伟

近日,一则消息引发广泛关注:中国传媒大学一口气砍掉了翻译、摄影等16个本科专业和方向。乍看之下,这似乎是一次大刀阔斧的“减法”,但细究其背后逻辑,却是一场深思熟虑、面向未来的“加法”革命。

事实上,从华东师范大学停招24个本科专业,到北京语言大学暂停多个翻译专业招生,再到李书福、雷军等人呼吁设立“智能电动车辆”一级交叉学科,这场席卷高等教育领域的专业调整浪潮,并非简单的资源收缩,而是一次对教育本质的深刻回归。

大幅调整优化专业的,多是与行业、细分领域脉搏紧密相连的特色高校。中传之于传媒、北语之于语言、华师大之于师范,它们对技术迭代与行业变迁带来的冲击尤为敏感。当AI能高效完成基础翻译、图像处理甚至内容生成时,那些培养目标与AI能力高度重叠的专业,势必要最先作出应对以求突围。停招保险学、俄语笔译等专业,并非否定其文化或知识价值,而是承认在新质生产力格局下,已经出现更有效、有大幅替代性的AI技术。这种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敏锐,恰恰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开放性、主动性,以及对

对学生、家长的高度负责。

从基础会计到初级代码生成,从标准化图像识别到简单文本翻译,当这些曾是某些专业培养目标的核心技能被算法轻易替代时,固守旧有专业范式无异于刻舟求剑。因此,砍专业的首要逻辑,是对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错位的果断纠偏。它迫使高校直面一个根本问题: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?如果答案仅仅是“熟练的操作工”,那么在AI面前,这样的教育注定被淘汰。

高校主动调整优化专业,真正的

智慧在于“破”之后的“立”。中传在砍掉16个专业的同时,新增了智能影像艺术、游戏艺术设计等前沿交叉专业。南京大学为所有新生开设了AI通识课,旨在培养智能时代的复合型

人才。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强调的“学科交叉‘破界’”,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倡导的“几个学院都隶属于一个领域”的超前探索,共同指向一个未来图景:打破传统学科壁垒,围绕产业链或重大社会需求,构建动态、开放、底层相连的专业群。这种“加法”并非课程的简单叠加,而是教学体系的深层重构,旨在培育AI尚难替代的核心素养:人本性思想、创造性禀赋、批判性思维、情感共鸣、价值判断与跨文化协作能力等。

专业优化的终极目标,是守护并激发人的主体性。在技术洪流中,教育的根本任务不是让人去和机器比拼效率,而是引导人、唤醒人回归那些无法被算法编码的“人性光辉”——创造力、责任感、审美力与伦理意识。砍掉的,是那些将人异化为简单重复劳动工具的“过时人才培养范式”;优化后的,应是能够孕育完整人格、赋能终身发展的“底层能力”与“无用之用”。这意味着,未来的专业建设必须实现三大转向:从封闭的知识灌输型转向开放的能力生成型;从单一技能训练型转向复合素养整合型;从脱离真实世界的象牙塔转向扎根中国大地、回应全球挑战的实践熔炉。

这场专业“瘦身”与“强体”的运动,是对“何为好的教育”这一命题的当代回应。做“减法”,是为了轻装前行,摆脱历史包袱;做“加法”,是为了拓展可能,拥抱未来。其最终指向,是在人机共生的新时代,确保人始终是目的而非手段,让每个个体都能在AI的辅助而非替代下,成长为更具尊严、更不可替代、更有创造力的“大写的人”。

## 求智论见

►新闻回顾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消息,去年,全国各级法院共发出2.3万余份家庭教育指导令,同比增长23%,且依法撤销997名不适格父母监护人资格。所谓家庭教育指导令,是人民法院依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,责令失职家长“补课”的法律文书。这组数据犹如一面多棱镜,不仅映照出家庭教育领域的现实困境,更以法治的刚性,彰显了国家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坚定立场。

# 2.3万余份指导令的警示

## 系统构建:以国家之力托举家庭之责

□陈宏卫

发出2.3万余份家庭教育指导令,依法撤销997名不合格监护人资格,这一系列雷霆手段传递出一个清晰且坚定的司法信号:孩子绝非家庭“私有财产”,而是独立的权利主体,他们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。那些“生而不养、养而不教、教而不当”的家长,必须直面法律的约束。

然而,法律的惩戒只是手段,而非目的。将家庭教育从传统的“家事”上升为须臾不可忽视的“国事”,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。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完备的国家支持体系,让司法的震慑力能够转化为日常的、浸润式的社会帮扶力,从而让更多问题家庭回归正轨。

要实现这一目标,首先要以顶层设计为引领。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4年多来,制度框架已初步建立,但各部门间的协同仍需深化。应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,形成党委领导、行政负责、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。在此基础上,持续修订完善《国家家庭教育指导大纲》,因地制宜

## 多元协同:以社会温情唤醒家庭责任

□李平

一份指导令,就是一个家庭的觉醒机会。收到指导令的家庭,往往面临多重困境:或因城乡流动而骨肉分离,或因经济压力与情感匮乏而挣扎,甚至施暴者本身就是家暴的受害者。面对这些复杂情况,单一力量难以破局,必须依靠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发力。

社区当是“引路人”。上海市长宁区组建以退休教师、社区工作者为主的“邻家妈妈”队伍,结对帮扶监护缺位的儿童,用最朴素的邻里温情填补监管盲区。在浙江一些街道,网格员发现家庭教育问题后,不是简单地记录上报,而是联动社区民警、妇联干部等开展“圆桌会谈”,把法律的刚性约束转化为面对面的劝导与帮扶,让指导令的落地更具温度。专业机构应是“撑伞人”。许多问题家庭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说教,而是深度的心理干

地编写指导读本,制定科学的服务规范和评估标准,为全国各地开展相关工作提供统一的标尺,确保指导令发出后有章可循、有据可依。

其次,要借助数字技术让优质资源突破时空限制。统筹建设家庭教育信息化共享服务平台,开设公益性网上家长学校和网络课程,让科学的育儿理念和方法能够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惠及包括偏远地区在内的所有家庭。

再次,必须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指导服务队伍。通过设立专门机构,负责家庭教育研究和公共服务产品研发,让家庭教育指导从偶尔的司法介入走向常态化的专业社会服务。心理咨询师、社区工作者、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力量的介入,能够让“补课”不再流于形式,而是真正触及家庭关系的病灶,提供深度的心理干预和科学的育儿指导。

最后,底线思维要求我们对特殊困难家庭提供精准帮扶。对于家长履行教育职责存在客观困难的家庭,如留守、困境儿童家庭,应建档立卡,提供生活帮扶、创业就业支持等关爱服务,切实为他们创造条件,从根源上减少因无力履职而导致的失职行为。

预、科学的育儿指导。心理咨询师为焦虑的父母疏导情绪,社工机构为困境儿童链接资源,家庭教育指导师手把手教家长如何与孩子沟通。

企业与社会组织也是重要的“搭桥者”。对于因生计奔波而无暇照顾子女的父母,一份稳定的工作、一项允许临时请假的制度,可能就是他们履行教育职责的前提。对于留守儿童的父母,企业若能提供探亲假期,社会组织若能协助解决随迁子女入学的难题,那些被迫断裂的亲子关系,就有望得以修复。

舆论环境则应承担“托底”功能。近年来,一些地方尝试对家庭教育指导案例做匿名化报道,只谈问题类型和干预方法,不给当事人打标签;一些网络平台开设“育儿帮帮团”话题,鼓励有过失足经历的父母匿名分享转变历程。当社会以支持性治理机制替代标签化批判,方能使问题家长卸下心理包袱,直面问题,重新学会如何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。

## 源头治理:构建全链条保护机制

□陆玄同

这组数据反映出部分家庭已陷入监护严重缺失的状态。许多问题在被纳入司法干预范围时,伤害已然发生,修复难度大、成本高。因此,亟须推动家庭教育支持体系由“事后补救”向“前端预防”转型,构建覆盖预防、干预与惩戒的全链条保护机制。

在预防端,应以服务替代说教,让支持走在监管之前。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基本公共服务,为新手父母提供普惠性培训课程,推广科学的育儿理念。指导不是评判,服务不是监督。面对那些因经济压力难以兼顾育儿的家长,或自身成长于情感支持薄弱环境的年轻父母,更应秉持理解与包容,提供有温度的帮扶。学校和社区可组织“家长沙龙”“父母课堂”等形式多样的活动,让家长“愿意来、听得进、用得上”。

在干预端,应注重隐私保护,避免二次伤害。建立学校、社区、公安、司法联动的风险排查机制,实现对困境家庭的早发现、早介入。干预必须讲究艺术:家访时避免穿制服、鸣警笛,避免在邻里间造成不必要的议论;询问孩子时有专业心理工作者陪同,选择安全舒适的环境,防止其因取证程序再次受到心理创伤。对于那些因离异、再婚陷入困境的家庭,更应保护隐私,不贴标签,不搞公开通报,给当事人保留改过的余地。

在惩戒端,应坚持司法权威与国家责任并重。对于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、确需撤销监护资格的个案,人民法院应依法及时作出判决,发挥司法的震慑与兜底功能。同时,必须同步构建系统化、专业化的安置支持体系。儿童脱离原生家庭本身即构成心理创伤,其后续照护应以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”为原则,重点保障其安全感、情绪稳定与心理健康。应在法院判决后立即启动个案管理机制,为每名儿童制订个性化帮扶方案,配备稳定的照护团队和心理支持力量,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,审慎评估其与原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结,推动实现从“脱离险境”到“健康成长”的平稳过渡。

## 漫画快评

### 强制包书皮何时休?

开学季,一些家长因学校强制使用统一塑料书皮而叫苦不迭。这一要求不仅加重家长负担,而且与教育部“无塑开学季”的倡导严重脱节。统一书皮虽便于管理,却违背环保初衷,甚至可能传递“形式大于内容”的错误价值观。学校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书本的实际使用情况,引导学生爱惜书本;出版社可提升教材封面耐磨防水工艺,从源头减少对书皮的依赖。

(王铎 绘)

## 一线声音

□陈松

刷短视频、看直播、玩小游戏,已成为不少老年人日常消遣的重要方式。这本是社会进步与技术普惠的体现,然而,随着“刷到凌晨三点”“一天看十几个小时直播”等现象频频出现,老年群体的“数字沉迷”问题也悄然浮出水面。日前,全国政协委员郁瑞芬建议推出“老年人防沉迷模式”。这一建议恰逢其时,既是对老年生活质量的关注,更是对数字时代人文关怀的深度思考。

老年人退休后社交圈缩小、生活节奏放缓,网络世界为他们打开了新的窗口——既能获取信息、联络亲情,也能找到兴趣同好、获得精神慰藉。但娱乐一旦失衡,便可能滑向沉迷。部分老年人因缺乏时间感知能力或自制力,在算法推荐机制的“精准投喂”下,陷入“越刷越停不下来”的怪圈。这显然背离了数字生活的初衷。

## “银发触网”亦需防沉迷

从教育的立场来看,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老年人缺乏系统的数字素养教育。他们成长于网络普及前的时代,对算法逻辑、流量陷阱缺乏足够的认知和批判性思维,面对精心设计的黏性机制往往难以自控。

当前主流平台的防沉迷系统多聚焦于青少年群体,对老年人几乎“零设防”。不少老年人独居或空巢,缺乏外部约束。加之部分平台为追求流量与停留时长,有意无意地放大刺激性内容,使得老年用户更容易陷入数字陷阱。

因此,有必要推出适老化防沉迷模式,通过技术手段引导老年人养成健康的数字设备使用习惯。比如设置单日使用上限、定时提醒休息、过滤低质内容等,让科技真正服务于人,而非操控人。

同时,更需开展主动的“数字启智”——通过社区课堂、老年大学、代际共学等形式,帮助老年人理解数字世界的运行逻辑,培养辨别信

息、管理时间、抵御诱惑的能力,让教育成为老年人驾驭科技而非被科技驱使的基石。

老年群体“数字沉迷”的背后,折射的是更深层的社会命题:如何构建一个真正包容、友好的老龄数字生态?一方面,平台应承担起社会责任,在产品设计中嵌入“适老思维”,避免将老年人视为单纯的数据流量;另一方面,社区、家庭也应主动介入,通过组织线下活动、加强代际沟通等方式,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,减少其对虚拟世界的过度依赖。年轻一代则应承担起“数字反哺”的教育责任,耐心引导长辈认识网络的双刃剑效应,帮助他们在数字世界中保持清醒和自主。

数字时代不应落下任何一代人,同时也不能让任何一代人迷失其中。唯有技术、制度与人文关怀协同发力,才能实现“老有所乐”与“乐而有度”的平衡。在技术狂奔的时代,慢一点、稳一点,或许才是对银发族最深沉的尊重。